

中国文联出版社

季羨林 著

万泉集



万泉集

季羨林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方 泉 集

季羨林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3插页 145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581-3/I·368 定价: 3.30元

作者小传

季羨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作家、教育家，外国文学研究学者。1911年生，山东省临清市人。青少年时代在济南读中、小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称外国语文学系），毕业后回济南任济南高中国文教员。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同年秋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先后兼任过系主任、副校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校委会副主任。自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被选为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比较

文学会名誉会长等。

季羨林从中学时代就喜爱文学，进大学后开始发表散文作品及外国文学译作，学习兴趣也更加广泛，所修课程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等。目前从事的研究工作包括：中印文化关系史、印度佛教史、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语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曾出版散文集《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羨林选集》、《季羨林散文集》，翻译并出版了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寓言童话集《五卷书》及其它梵文文学作品，专著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初探》、《〈大唐西域记〉校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

自序

万万没有想到，五十多年来的散文结集《季羨林散文集》还没有算是完全出版，自己写的散文一类的东西又有了二三十篇，^①七八万字，可以结成一个集子了。

这是不是表示自己又焕发了青春活力，创作力又旺盛起来了呢？我想，也不是的。我多次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文学家，也不想作文学家，只是积习难除，每有所感，便不禁技痒，拿起笔来。所以我写东西，被动的时候居多，主动的时候较少。现在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完全不是出自事前的计划，而是临时机遇凑巧，心血来潮。借用一个现成的说法，我的所谓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

所谓机遇凑巧，本集的第一篇文章：《悼念朱光潜先生》，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写这篇文章，事前完全没有想到。我决不能象诸葛亮那样掐指一算，算就了孟实先生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离开人间，于是潜心构思，一旦预见实现，立刻就写出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来。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实上，孟实先生逝世十分突然。他刚一逝世，《文汇报》的记

者就找上门来，要我写一篇悼念文章。紧接着北大有关部门又受外面有关部门的委托，要我写同样的文章。限定的时间只有一两天。就是在这一两天内，我也不能摒除一切杂事，坐下来，专心一志地写文章。结果是，我忍着悲痛，连半点构思的余裕都没有，拿起笔来，就写了下去。什么章法布局，修辞炼句，完全没有去想。总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写成了。文章是自己的好，我没有这么狂妄。完全出我意料，很多朋友非常欣赏这篇东西，还立刻被选进一种什么教材里去。

从内容上来看，本集的文章约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悼念、怀旧；一类是国内旅游；一类是出国访问。悼念和怀旧之作是容易理解的。是不是人年老了就容易怀念过去的人和事呢？可能是的。但是，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我虽然久已年逾古稀，但是承认自己老了，还是最近的事。我自己觉得，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没有老相。骑自行车的速度还能让家人和朋友为我担心。我向前看的时候远远地超过了向后看，我心中暮气并不多。

但是，自然规律是无法抗御的。师友中离开人世者年年都有，最近好象更多了起来。小学的老友中无一存者。中学同学前几年生存者还不少，还能形成一个小小的队伍。不知怎么一来，这个队伍却日渐疏稀，宛如深秋的荷塘，秋风屡起，花叶飘零，原来是“接天莲叶无穷碧”，而今只是“留得残荷听雨声”了。再下上几场瑞雪，渐渐地连残叶都一扫而光，荷花的魂魄只能蜷缩在淤泥中做春天的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我的怀旧的文章就越来越多起来了。

国内旅游，完全出于偶然的机缘。去年暑假，我到庐山去避暑，参观了一些名胜，认识了一些人，抚今追昔，顿有所感，一阵阵心血来潮，就在庐山当地，在松涛声中，白云堆里，写了几篇短文。

至于出国访问，当然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去年一年，出国三次，两次到日本，一次到尼泊尔。日本我以前访问过，去尼泊尔却是第一次，因而印象特别深刻。在短短的五六天内，在繁忙的访问、宴会、招待会之余，每天黎明即起，执笔为文。窗外弥漫天地的浓雾，浓雾中传来的犬吠声和鸽子的咕咕声，都仿佛能助我文思。我心旷神怡，逸兴遄飞，不知不觉就写成了随笔十一篇。这是我一生最多产的时期。

有人提醒我，是否能把最近一年多写的散文收集一下，出一本小集子。这个想法是颇有一些诱惑力的。我自己有点吃惊，最近对自己写的东西逐渐喜欢起来了。难道这也是一个衰老的征象吗？不管怎样，我立即着手来考虑想收的文章。董其事者仍然是李铮同志。搜集的范围是近一年多以来写成的散文，共二十八篇；有的已发表，有的还没有发表。

既然要出一个集子，就必然要有一个名字，而起名字又往往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过去曾使用过一个懒办法：用地名做集名，比如说《朗润集》，指的是住了二十多年的朗润园；《燕南集》指的是我一度想搬去而终于没搬成的燕南园。我现在想袭用这个懒办法。我住的楼后仅一墙之隔有一条万泉河，河并不宽，流水也不急。我傍它居住了将近三十年，我很喜欢“万泉”这个名字，现在就用以名吾集。泉水象征清洁，象征生命，一泉已能令人愉悦，何况是万泉！试

想万泉喷涌，珍珠如练，碧波千顷，清澈见底，这是何等美妙的景象！虽然与我的集子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是有了近三十年的睦邻高谊，冒昧借用它的名字，想它也会不以为忤吧！是为序。

1987.12.18.

自 序 续

稿子整理好了，编排好了，自序写完了，交到出版社了，等了三年多了；然而书没有出来。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用不着责怪任何出版社。

在这样的情况下，真好象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曹利群同志，居然征得了领导的同意，接受了这一部稿子。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称之为“绝处逢生”，难道还能算是夸大吗？我自己的心情怎样，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凡事有一失必有一得。时间拖了几年，当然算是一失。可是，就因为拖了几年，我又在梵文和吐火罗文的夹缝里，写了一些散文，计算起来，已有四五万字了。我现在不想再把这些文章另行收集，另起集名，干脆收在这一部已经命名的集子中，增加了分量，壮大了声势，岂不猗欤盛哉！很有意思的，我认为用今年元旦那一天写成的《八十述怀》作为殿军，好象是要借八十诞辰这个机会给我六十年的散文创作来一个小结。但是，我并不是想从此搁笔，一点这样的想法也没有。我自谓，精神和身体都还未到老态龙钟的程度，

今后只要有真实的感触，我还是要拿起笔来的。

为了保存历史原貌，原来的《自序》，一字不改，仍然让它作为扩大了《万泉集》的序，印在这里。但是，情况毕竟变了，应该有一点说明之类的东西，所以写了这一篇《自序续》。

编排整理工作都出自李铮同志之手。

1991.1.4.

目 录

作者小传

自序

自序续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1)
——悼念朱光潜先生	
我和外国文学·····	(7)
槐花·····	(15)
我的童年·····	(18)
日本人之心·····	(28)
诗仙堂·····	(28)
箱根·····	(32)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38)
一个影子似的孩子·····	(47)
游石钟山记·····	(50)
登庐山·····	(53)
尼泊尔随笔·····	(57)
飞越珠穆朗玛峰·····	(57)
加德满都的狗·····	(58)
乌鸦和鸽子·····	(60)
雾·····	(63)

神牛·····	(66)
游巴德冈故宫和哈奴曼多卡宫·····	(68)
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	(71)
游兽主 (paśupati) 大庙·····	(77)
望雪山——游图利凯尔·····	(80)
在特里普文大学·····	(84)
别加德满都·····	(87)
1987年元旦试笔·····	(90)
遥远的怀念·····	(92)
怀念西府海棠·····	(100)
怀念衍梁·····	(104)
法门寺·····	(108)
悼念曹老·····	(114)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118)
重返哥廷根·····	(123)
梦萦未名湖·····	(131)
我与百花·····	(136)
悼念姜椿芳同志·····	(138)
回忆梁实秋先生·····	(141)
虎门炮台·····	(145)
北京忆旧·····	(148)
梦萦水木清华·····	(152)
晨趣·····	(156)
悼念沈从文先生·····	(159)
室伏佑厚先生一家·····	(165)
寿寿葬·····	(171)

我爱北京·····	(174)
回忆雨僧先生·····	(178)
忆念丁声树同志·····	(181)
月是故乡明·····	(182)
忆念胡也频先生·····	(185)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190)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	(194)
神奇的丝瓜·····	(201)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	(204)
——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八十述怀·····	(210)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悼念朱光潜先生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这个消息对我并不突然，因为他毕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而且近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对我国的学术界，对我自己，不是更有好处吗？

现在，在北京大学内外，还颇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做我的师辈。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教授了。但是，我真正听过课的老师，却只剩下孟实先生一人。按旧日的习惯，我应该称他为业师。在今天的新社会中，师生关系内容和意义都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尊师重道仍然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我对于我这一位业师，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而今而后，这敬意的接受者就少掉重要的一个了。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

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象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孟实先生在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他们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其中有不少理论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忆不忘。要说里面没有唯心主义成份，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只要是一个有良心、不存心骗人的人，他总是会在不同程度上正视客观实际的，他的学说总会有合理成份的。我们倒洗澡水不应该连婴儿一起倒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吗？但是，你能说，他们的学说完全不正确吗？我们过去有一些人习惯于用贴标签的办法来处理学术问题，把极其复杂的学术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这种倾向到了十年浩劫期间，在“四人帮”的煽动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荒谬的程度。“四人帮”竟号召对相对论一窍不通的人来批判爱因斯

坦，成为千古笑谈。孟实先生完全不属于这一类人。他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自己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一步一个脚印，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离开清华以后，我出国一住就是十年。在这期间，国内正在奋起抗日，国际上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八年，家书抵亿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完全同祖国隔离，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946年回国，立即来北大工作。那时孟实先生也转来北大。他正编一个杂志，邀我写文章。我写了一篇介绍《五卷书》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杂志上。他住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他的办公室（他当时是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和我的办公室相隔也不远。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我曾拜访过他。说起来似乎是件怪事，然而却是事实。现在恐怕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什么“社会活动家”。其实我的性格毋宁说是属于孤僻一类，最怕见人。我的老师和老同学很多，我几乎是谁都不拜访。天性如此，无可奈何，而今就是想去拜访孟实先生，也完全不可能了。

我因为没有在重庆或者昆明呆过，对于抗战时期那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于朱先生当时的情况也完全不清楚。到了北平以后，听了三言两语，我有时候也同几个清华的老同学窃窃私议过。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其中过程细节，我完全不清楚。然而这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先生毕竟是经受住了考验，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